



《萧殷全集》： 最好的纪念

□傅修海

梳理萧殷的人生轨迹，放眼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毫无疑问，萧殷算得上20世纪中国现象级的文艺典型人物——他不仅是文艺界领导、有才华的作家和光荣的战士，也是与广大写作者有着普遍而广泛联系的、接地气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者和推动者。

萧殷的著述可谓宏富，更有着相当宽阔、有代表性和辐射力的文艺人事往来。上述这些考量，都清晰地呈现为刚刚出版的《萧殷全集》(10卷)。我们相信，和许许多多的“全集”一样，《萧殷全集》(10卷)肯定是不够“全”的。但即便以此为准，《萧殷全集》(10卷)的体量和丰富程度也已经相当令人震撼。

就文学创作而言，《萧殷全集》含“文学编”4卷、“书信编”3卷、“影存集萃编”1卷、“岁月留痕编”1卷、“年谱编”1卷，总字数400余万。其中“文学编”收入文学创作类的作品105篇，文学评论类有3卷，含文论探索、作家作品论、文艺时评等69篇，创作论、文体论、写作论等71篇，文学问答、文学访谈、文学飞鸿、文学序跋等75篇。从《萧殷全集》“文学编”来看，萧殷的文学史意义非常特殊。除了一般作家和评论家共有的特征之外，《萧殷全集》里的萧殷，就已经是非常突出的典型。萧殷文学批评的文字形态、探索方式、互动通道与文论旨趣，证明了他是一个丰富而意味的个案。萧殷曾经当过战地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根据地报刊主编、国家级文艺报刊总编、国家权威文艺研习机构负责人、华侨高校中文系创始人、省级作协负责人等，其文艺事业脉络的覆盖面之广、涉及人数之众、牵涉人事之多，更是令人震惊的存在。

萧殷现象的奇特之处，也同步呈现在《萧殷全集》“书信编”3卷。“书信编”收录书信1100余通，既有萧殷与鲁迅、郭沫若、巴金、艾青、丁玲等文坛大家的往来通信，也有辅导王蒙、陈国凯、程翠章、弘征等不同时期文学青年的文字往来实录。此外，还收录了一些萧殷写给友人、家人的书信。

萧殷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文艺或者文学，也在于他在当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特殊贡献。这一点从《萧殷全集》的构成即可见。《萧殷全集》(10卷)，除了主体部分的“文学编”4卷和“书信编”3卷之外，还有“岁月留痕编”1卷、“影存集萃编”1卷、“年谱编”1卷。“岁月留痕编”收录了萧殷早年发表的作品手稿、手写简历、口述、笔记摘抄、未完稿等珍藏品、去世后收到的唁电与悼念书信、相关研讨与纪念文字等。“影存集萃编”以丰富影像展示萧殷工作、写作、与朋友交往、培养青年作家、家庭影像和对家乡的眷恋等8个专题。这些影像瞬间，再现了许多珍贵历史影像，将成为考证某些历史事件的依据。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萧殷全集》不仅收有来自萧殷的22部著作、340篇文章，以及与同事、学生、亲友的大量往来书信，还收入了可以纵观萧殷一生的“年谱编”。萧殷留下的珍贵笔记和照片，固然留着特定时代的色彩，这些不仅是理解萧殷的重要资料，更是探讨、研究、思考逐渐远去时代的重要文献。

萧殷是非常朴素的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弘扬民族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语境里，广东省委宣传部特批资金，花城出版社、河源市图书馆、萧殷文学馆等多方筹措、共襄盛举，群策群力编辑出版《萧殷全集》，此举意义重大，内涵极为丰富。一方面，这固然是为了致敬这位朴素的共和国文化事业的燃灯者，因为他奋斗一生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学习。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更开阔、更丰富、更饱满地理解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的场态和生态，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艰辛走过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当然，对于萧殷，人们最好的怀念和致敬，就是读他的书，学习他的思想，传承他的精神，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就此而言，编辑、出版、阅读《萧殷全集》，本身就是学习萧殷的有机组成，这就是对萧殷最好的纪念。如此，则萧殷之幸，也是《萧殷全集》之幸，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思想之幸！

萧殷，这位深度参与并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进程的文艺工作者，是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守夜人，也是广东文艺评论工作的开拓者。他朴素坚实的足迹，回荡着人民文艺事业的深远回声。

萧殷，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艺批评战线重要的评论家，《文艺报》创刊初期三位主编之一、复办后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创建者，广东省作协成立70年来在中国文学界领风气之先的代表之一，至今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

奋进·革命·朴素 萧殷的人生春秋

萧殷出生于1915年中秋，原名郑文生。家境贫寒的萧殷努力读书，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理想的感召。1925年北伐军第二次东征过境，年仅10岁的萧殷开始了对美好未来的变革憧憬。读初中时，萧殷初步展露文学才华，他与一些文学青年创办了《湖畔》，并在第二期《湖畔》上发表了小说《明天》和《风雨之夜》等散文。中学毕业后，萧殷到广州谋生，考上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在广州学习一年后，萧殷因贫辍学。辍学后萧殷到龙川乡村师范教绘画，1934年转到佘城小学任教，1936年春转至龙川县民众教育馆工作，自此结识了当地的一些革命者，开始从事一些革命工作。其间，萧殷写了《借债》《阴阳》等小说，散文《哥哥的脸》，以及报告文学《年关杂写》等。1936年1月，萧殷离开佘城，到广州参加多次革命活动，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写了许多杂文批判现实，并在《珠江日报》上发表。另有一些散文在《黑暗》《市民日报》等发表。1936年8月，萧殷与赖少其、杜埃、楼栖等一批进步青年会集到白云山麓黄婆洞，酝酿成立“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公开发表成立宣言。

1936年10月初，苦闷中求索的萧殷，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简要介绍了广州革命斗争的形势，一并寄去散文《温热的血》。萧殷日夜盼着鲁迅先生的回信，没想到先生在收到他的信稿10天后就逝世了。鲁迅在10月9日的日记上有“得萧英信并稿”一句，纸短情长，见证了他们交往的历史瞬间与精神联系。

1936年12月，萧殷与赖少其等逃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防护团”兼任战地记者。1938年1月，萧殷从上海撤退到武汉，参加范长江等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编辑机关刊物《新闻记者》月刊。1938年8月，萧殷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8年10月17日，萧殷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萧殷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工作。1941年萧殷从太行山再次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四部任教员。

萧殷1937年起进入报社工作，1937年担任《新中华报》编委，1939年任华北《新华日报》编委兼特派记者，1945年任《晋察冀日报》编委兼副刊主编。1946年萧殷在北平编辑《解放三日刊》，兼任新华社北平分社采访部主任。1947年4月，萧殷调到华北联大文学系任教，负责讲授《创作方法论》等课程，重点讲解典型论。1947年，他在《冀中导报》编发徐光耀的处女作《周玉章》并加按语推介，这是他扶持青年作者的起点。1948年，萧殷任《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萧殷出席会议并担任会务工作。随后，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工作，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任《文艺报》主编。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期间，萧殷还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校外辅导员老师。1953年上半年，与陈涌共同负责《人民文学》编辑部全部工作。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文艺学习》月刊，萧殷任编委。1955年萧殷任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副所长，1958年任复办后的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1960年是萧殷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年头，也是广东文坛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年，萧殷回到了广东，到故乡龙川体验生活，创作长篇小说。当年11月，萧殷当选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62年1月，广东省作协《作品》杂志复刊(新一卷第一期)，萧殷任副主编。20世纪60年代，萧殷在《羊城晚报》上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调研组”名义发表了《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论〈金沙洲〉》。1978年年底开始，萧殷组织在顺德和广州召开文艺界座谈会，研究文艺形势、文艺战线，直到1983年去世。其间，萧殷铸造并深刻影响了广东的理论批评风气和学术精神，培养了广东两代文学评论家，构建了广东文艺批评的基本队伍，创办了广东省作协的理论研究部门，并于1983年创办中国第一份文艺理论月刊《当代文坛报》。

萧殷的一生，是奋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更是朴素的一生。在25岁风华正茂的时候，萧殷的教员、记者、编辑、作家的四重混合身份开始确立。

回望萧殷

□傅修海



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左起:萧殷、巴金、蹇先艾、陈沂,1979年11月)。

而他的职业和事业框架，则在32岁时基本已经成形。此后，萧殷一直努力耕耘在共和国文化事业的田野上。1985年萧殷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奖，1986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这正是对他朴素恬淡而又热血无悔的人生春秋的最好奖赏与评价。

体察者·书写者·燃灯者 萧殷的文学背影

回望20世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萧殷无疑是独特的那一个。萧殷较早就开始就从事革命事业，他用自己的笔(包括画笔)、眼睛(包括相机镜头)，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进程。萧殷用心锻炼自己，也热心培养他人，萧殷始终与战友们、与人民群众在一起战斗，一起前进。温儒敏高度评价萧殷，“他不但是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事业组织者。他的整个生命都融汇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

萧殷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一生，是创作者的一生，也是关爱者的一生，他是共和国文学文化事业的体察者、书写者、燃灯者——这不仅是萧殷当年砥砺前行在历史现场中动人心魄的足迹，也是他镌刻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催人奋进的文学背影。

萧殷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现场体察者。在早年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萧殷主动接受革命的感召，从此奋不顾身参与到革命文化事业当中。在萧殷的人生履历中，他当过战地记者，办过战地报纸，从事过根据地的新闻传播工作，同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将革命实践与理论素养、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结合，文艺与革命互相激荡，相互增益，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点点滴滴、切切实实的贡献。显然，萧殷的那些在根据地战地氛围中创作的作品，宣传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萧殷写下了许许多多的战地通讯、战地新闻，及他作为战地摄影记者拍下了许许多多的照片和记录性文字，也从另一个侧面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于那段烽火连天岁月感知。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现场的体察者，萧殷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事业的意义，在此不在彼。

萧殷是中国革命思想、生活与情感变动的书写者。萧殷的一生，是文艺工作者的一生。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萧殷，不仅从事文学创作，他也同步参与、主导着革命文化事业的组织、传播、培训、教育工作。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角色远比文学家丰富，充满着变革年代特有的张力，也更能涵盖萧殷的历史意蕴。萧殷作为连接共和国前后的文艺工作者的典型，尤其值得开掘。在这个意义上，萧殷那些特写与报告风格浓烈的文学创作，对根据地等革命现场即时性互动的写作，以及融教员、记者、编辑、作家的四重混合身份，乃至于兼有党政、新闻和文艺的特殊职业和事业框架，都可以得到丰富饱满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情境理解。萧殷曾说：“现实生活既多姿多彩，值得用彩笔去描绘它，又有汲之不尽的源泉；只要作品不腐蚀人们的心灵，不败坏人们的趣味，能将人们引向一个美好的方向——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最后胜利。”联想到萧殷的书写趣味和宗旨所在，他的这番话，显然不仅仅是在谈题材或者论写作，而有着更宽广的怀抱，更遥远的寄慨。

萧殷是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事业的燃灯者。萧殷朴素的一生，最让人感念的，当然还是他对文学青年，尤其是底层的文学爱好者的赤忱扶助与拳拳

关爱。萧殷曾以《论文学与现实》等大量接地气、蕴民气、有骨气的著述，开创了文学评论新境界，更以近百方的文学书简悉心培育无数基层文学青年；他始终亲自致力于共和国革命文化事业和文学工作，也始终热心积极帮助了几代文学青年成长，可谓是一批后来成为中国文学中坚力量的文学青年的伯乐。这方面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例子，大概就是他时为中文学青年王蒙的提携与奖掖。在王蒙眼里，萧殷正是发现其文学才华的“伯乐”，这份情谊让他一直感怀在心，并屡次撰文怀念恩师。1987年6月30日，在给萧殷夫人陶萍女士的信中，王蒙说：“萧殷师一生勤勤恳恳，俯首甘为孺子牛，许多年轻人受到他的教益。回想五十年代，我二十岁的时候，他对我的极不成样子的处女作初稿《青春万岁》的鼓励和指点，回想在赵堂子胡同萧殷师的小院谆谆受教的情景，永生难忘。”

战士·斗士·文士 萧殷的品格

萧殷是真切切切的战士。萧殷从底层生活当中一路走来，从底层困苦挣扎的生活中走来，真切认知到中国社会的变革需求和希望所在，出于实践考察和思想觉悟而主动参与到民族解放与伟大复兴的事业当中。萧殷持笔从戎，参加前线的战地新闻采访与报道，从战地摄影、采写报道到办报纸，从文员培训到文化教育，萧殷历经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草创期与开创期，历经战火纷飞的岁月，从延安走到北京。作为新中国文学文化、新闻传播、教育培训事业的见证者和从业者，他始终坚定地与中国一道前行。

作为一名战士，萧殷表现非常勇敢，非常坚强。1940年1月，报社派萧殷到冀南采访平原游击战及政权建设的经验，2月到冀南时适逢“剿逆”战争，他只好随军赴前线，转战一个多月。3月，萧殷跟随王宏坤副司令员回军区司令部，以最快速度急行军200余里。时至半夜，在匆匆出村时，萧殷忽然被马踢，致左腿胫骨被踢碎，送入军区医院治疗两月无效，膝盖以下将要腐烂，医生建议截肢。“没有腿，我怎么打鬼子！”萧殷坚决拒绝。事后，萧殷被冀南军区评为“二等乙级残废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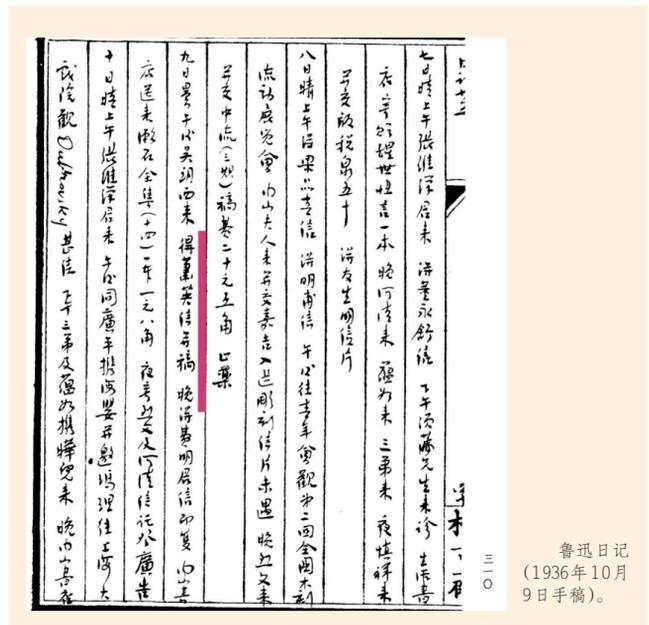
誉军人”。一个亲历战火前线的作家和战士，这正是萧殷不一样的地方。

萧殷是刻苦自励的斗士。萧殷是自学成才的作家，是自觉学习的作家，是始终自觉接受先进的理论，结合自身生活实践，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勤勉写作的作家。萧殷不仅自学革命理论，努力摘抄各种知识习得，还自学书法，自学书籍装帧，自学摄影，自学写作。从这个角度上，萧殷无疑是斗士，敢于挑战未知，挑战困难，更是挑战自我。萧殷是跟随着中国革命历史浪潮一道前进的作家，他接受的正规教育并不太多，但是他非常主动学习、热爱学习，也善于学习。萧殷在《月夜·后记》里说：“虽然当时担任了很重的理论工作及评论工作的任务……但还是本性难改，对自己一向习惯了的形象思维，依然很有兴趣……我只要一离开办公室，一深入到农村中，深入到人民斗争的漩涡里，深入到人民生活气氛的中间，我每次都由自主地提起笔来，不是写一两篇小说，就是写几篇散文。”

萧殷是文士。萧殷的“文士”，更指向传统与现代融通的品格。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思潮论战的特殊时期，萧殷始终洁身自好，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人，保全自己。但萧殷又不是封建朝代拘泥于清风傲骨的名士，他始终心系群众，自觉与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革命事业最需要的是人，最宝贵的也是人，靠个人英雄主义并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萧殷非常自觉地投入到文艺大众化事业中。对萧殷来说，个人成名成家并不重要，培养共和国文艺事业接班人事业更为重要。正如萧殷自己所言：“有什么办法呢？即使到现在，还不断地有青年写信来要求解答那些基本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实际上三十年前已经解决了。既然这些问题仍然不断地被提出来，我就只能不厌其烦地再三进行阐述了。”萧殷花费巨大心力辅导文学青年，答复基层文学爱好者，与基层的写作者频密而朴素地交往，留下了许许多多与这些爱好者、写作者和民众读者的通信。那一捆一捆的编读往来材料，有些为了普惠更多的写作者而发表了。更多的，一对一的辅导和沟通的信札，流落到千千万万的群众当中、生活当中。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文艺大众化的工作力量到底有多大。但是我们相信，萧殷的那些温暖的回信，那些或长或短的文艺答复，一定照亮着基层文艺工作者暗夜前行的路，温暖了他们向往光明的内心。

由此可见，萧殷是自觉贯彻文艺大众化的文艺工作者，他将学习和生活与革命事业结合起来。萧殷写作的自觉是现代文士的品格，这是他发自内心对人民解放事业的热爱与追求，更是心系群众、扎根基层的现代中国知识者的思想觉悟和日常行动。这也许是因为他曾经亲历战地新闻事业的战士日常，因此才有着新时代同行者的独特心路历程与朴素自觉。

萧殷无论是做文艺教员，当写作辅导员，还是作为文化行政事业的管理者、参与者与组织者，他都没有忘记过自己作为时代同行者的初心。尤其是他作为位居共和国文化事业重要岗位的管理者，萧殷依旧朴素低调，无欲无求，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非常难得的。萧殷永远是共和国文化事业的守护者与呵护者，他为中国文艺大众化事业倾其所有、呕心沥血，他既有文的知识和才华，也有士的品格和操守。萧殷无疑是才华的作家，但他的重心始终是在于培养更多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在于整个共和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壮大。萧殷没有个人的私心，也没有所谓的小圈子，他着眼大众的、整体的事业。正因为这样，萧殷让我们深深怀念——他是纯粹的人，是朴素的人，是脱离了狭隘才子趣味的人，是行走在文艺大众化的宏伟事业道路上的人。



鲁迅日记(1936年10月9日手稿)。